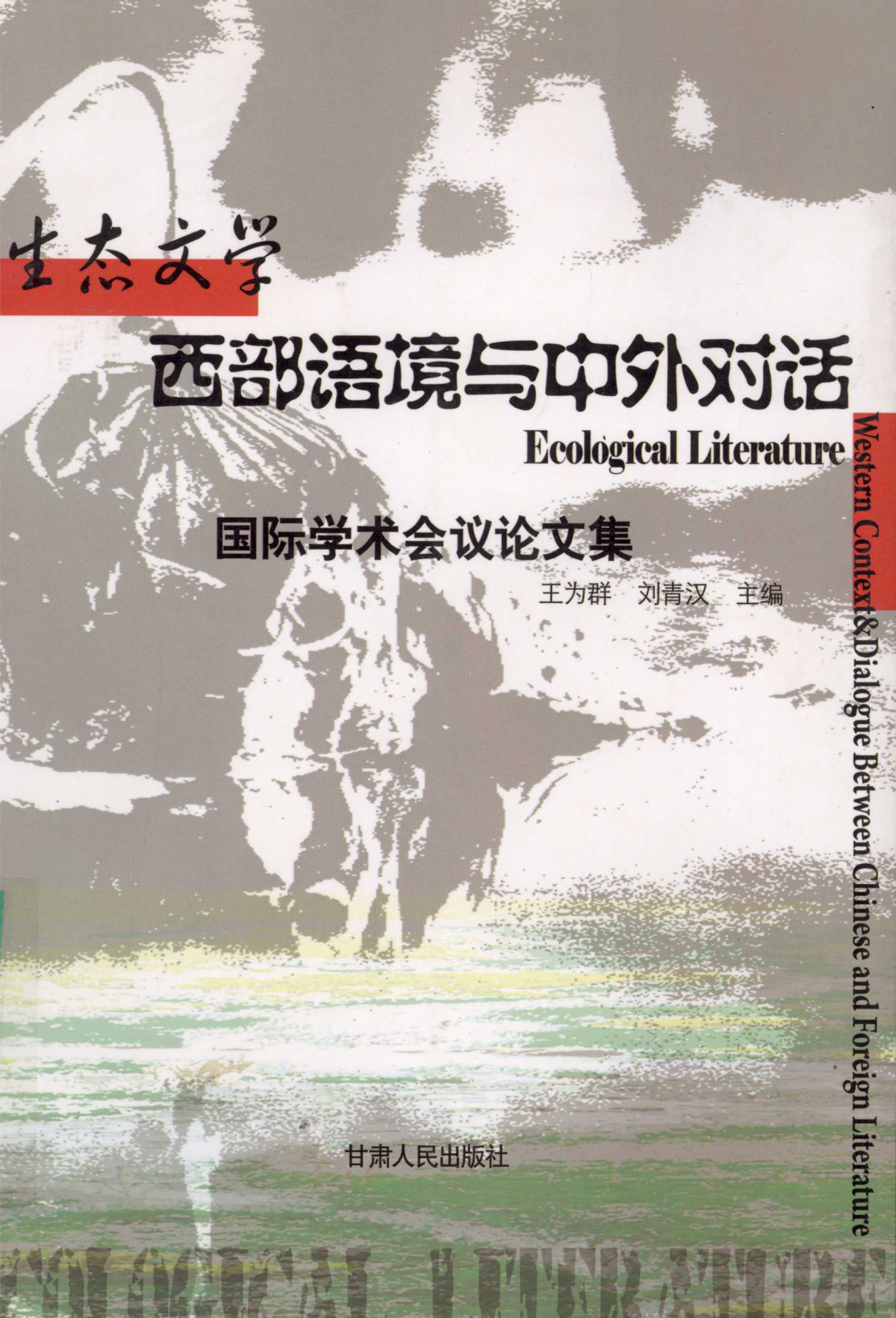




生态文学

西部语境与中外对话

Ecological Literature

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王为群 刘青汉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Western Context &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生态文学

ECOLOGICAL LITERATURE

西部语境与中外对话

Western Context & Dialogue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文学. 西部语境与中外对话/王为群, 刘青汉主编.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7-226-03133-9

I. 生… II. ①王…②刘… III. ①比较文学—中国、外国—文集②文化生态学—西北地区—文集③文化生态学—西南地区—文集 IV. I0-03 G1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4169 号

责任编辑:高文波

封面设计:王 若

生态文学:西部语境与中外对话

王为群 刘青汉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25 插页 2 字数 348 千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978-7-226-03133-9 定价:39.80 元

主 编:王为群 刘青汉
副主编:李 莹 李 明 吴玉珍 彭 青
编 委:武亚玲 温 越 李孝英 李晓霞
于 蘋 张 丽 任红红 王彦彦
冯佩昕 郭令原 唐翰存
秘 书:欧阳峻 范爱荣 魏 艳 桑晓林
王 强

目 录

生态文学:西部语境与中外对话

——中外文学对话与西部文化建设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王为群(1)

比较文学史上的“恒常危机”

——兼论生态论述 张汉良(7)

谈韩国生态文学的概况与特点

——兼谈中国大陆及台湾的生态文学的比较视野 朴宰雨(16)

对孟浩然诗中体现的自然观的考察 金贤珠(18)

生态文学勿要忽略人与自然关系的恢复和重建 李青松(24)

论生态文学的价值系统 王为群 刘青汉(27)

环境文学的区域叙事与生态智慧:以《狼图腾》为例 宋丽丽(34)

生态文学对科技负面效应的警示 刘青汉(43)

利哈乔夫的文化生态观浅说 杨素梅(48)

西部生态与西部文学的几种关系 徐兆寿(55)

沈从文的自然及其当代生态意义 张语和(64)

生态叙事的视角与模式

——以《断头台》与《狼图腾》的比较为例 王彦彦(70)

论莱蒙特长篇小说《农民》的风景描写意义 徐美恒(78)

底线共识:为和谐健康的精神生态 张懿红(85)

21 世纪生态女性主义写作理念的建构 吴玉珍(90)

源氏:女作家笔下的理想贵族形象

——对《源氏物语》的重新解读 李 莹(96)

批判性是生态文学和现实主义的共有品质 温 越(102)

生态批评——以生态伦理为核心的文学批评 温 越(110)

生态文学言语特质谈 李孝英(118)

自由观:鲁迅与胡适的比较	唐翰存(122)
我们为什么要坚持“人的文学”?	唐翰存(134)
从女性主义角度看《十日谈》中的宗教伦理观	任红红(141)
东西方诗论的联姻:戴望舒的诗歌创作	任红红(147)
Curiosity in Bleak House	Zhu Xiaoling(153)
T. S. Eliot's Critical Theories: A Key to <u>The Waste Land</u>	Yu Li(160)
论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创作中的悖论情结	
The Paradox in Isaac Bashevis Singer's Works	王玉玲(170)
简析《到灯塔去》中伍尔夫的生态女性情怀	沈渭菊(180)
跨文化视野下的比较与融通	
——古典诗学的方法论研究	刘 猛(187)
“意识中心”眼中的道德	
——解读《黛西·米勒》的叙事伦理	桑晓林(194)
生态文学视野中的当代文学作品解读	
——我看《狼图腾》、《中国虎》、《刺猬虎》	吴玉珍(201)
黑色幽默文学新探	安 婕(207)
人与自然的和谐	
——简析《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的人性回归	张亚锋(219)
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生态观	高 翔(227)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从美狄亚、细侯“戡子愆夫”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张 丽(237)
新丝绸之路生态旅游与可持续发展构想	于 蘋(242)
人类中心语境下的生态批评	魏 艳(249)
西部文化背景下的都市文学	彭 青(254)
生态视野下的陶渊明	范爱荣(263)
诗学与视域	
——论比较诗学及其比较视域的互文性原则	杨乃乔(267)
希伯来文化对欧美生态文学的资源意义	刘青汉(284)

生态文学:西部语境与中外对话

——中外文学对话与西部生态文化建设 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王为群

2007年8月11日至13日,由兰州交通大学中文系与《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文艺争鸣》编辑部和上海复旦大学比较文学研究室协办的“中外文学对话与西部生态文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兰州召开。来自国内外大学、研究机构的61名学者参加了学术研讨会。

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侯效岐副部长、高志凌巡视员、兰州交通大学王铁军副书记、李引珍副校长出席了开幕式。侯效岐副部长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中外文学对话与西部生态文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外比较文学、生态文学和西部文化及生态建设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希望会议在建设西部和谐文化及和谐生态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表示如果将会议届次化,突出西部和生态特色,甘肃省委宣传部将作为甘肃的一项理论建设工程给予积极支持。兰州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王铁军研究员在开幕式上致词,《文学评论》编辑部常务副主编党圣元研究员、《文艺争鸣》编辑部主编张未民教授、复旦比较文学研究室杨乃乔教授、韩国外国语大学朴宰雨(Park . Jae Woo)教授等在开幕式上发了言。

本次会议以“中外文化对话与西部文化建设”为主题,就“生态与关怀——比较文学视野下的生态文学与西部文化发展”、“交流与过滤——中西文化镜像中的西部文学与异域文明”、“挑战与机遇——中国西部地域作家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格局”等议题进行了集中交流与深入研讨。会议共收到论文40余篇,论文集将在近期出版。

这次会议关注的主要问题有:

一、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与建设问题

台湾大学张汉良先生的发言对比较文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学理性概括,他认为,比较文学学科,起始于法国,最初主要研究跨国文学要素之间因缘关系的流变,关注作品翻译、流传等,注重外围文献资料的收集,对文学文本的关注比较

王为群,兰州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

少。20世纪40—50年代,欧洲移民到美国,比较文学的欧洲传统被改变,研究回到了作品本身,开展了纯文学文本的研究。70年代初,欧美的研究有了很大转向,他们认为无法把文本从历史、社会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去孤立欣赏,强调语言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1970年开始,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泯灭了,对非文学文本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不再专注传统的文学文本,而是研究那些未被重视或不太被接受的文本。80年代以来研究者对理论本身发生了兴趣,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相互干涉,文学与非文学彼此颠覆,使比较文学学科发生转向。关于“危机论述”,张汉良指出,危机是“他或她正处于在一个学科发展过程中令人忧虑的阶段,学科出现了病灶,再继续下去情况可能会更恶化。”关于晚近的殖民论述危机问题,张汉良通过对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斯匹瓦克(Gayatri Spivak)的论述危机进行了理性阐释。杨乃乔(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从比较诗学的角度出发,介绍了“互文性”概念的语义谱系及语际旅行的概况,认为“互文性”乃比较诗学研究的客体,“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从“相互(inter)”、“文本(text)”与“… …性质(-ity)”三个层面的意义中整合而来的一个外来诗学概念,是指涉多部相关文本及其语义系统之间意义的交叉性和交互性,作为中外诗学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文性,是比较视域所指向的研究客体。“互文性”最早由朱莉娅·克里丝蒂娃在60年代创造和使用,指“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已有的和现有的表述的易位… …”,此概念的提出,对讨论多元文化语境下文学理论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当代的批评词汇表中,互文性是最为通常使用或误用的术语之一”。在国内汉语学术界,“intertextuality”也被翻译为“文本间性”,而“间性”是指涉两种以上具有互涉意义之间的关系性质,格雷厄姆·爱伦在《互文性》一书中曾介绍与使用过六个相关的概念:text(文本)、textual(文本的)、textuality(文本性)、intertext(互文、互文本)、intertextual(互文的)、intertextuality(互文性),其中没有一个概念可以在字面上直接翻译为“文本间性”,尤其是“间性”,把“intertextuality”翻译为“互文性”,作为一种异化翻译,要比作为归化翻译的“文本间性”更能保持相当的源语特色。杨乃乔说,必须进一步给比较诗学的学科研究范围划界,把比较视域的研究客体规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免比较诗学由于研究客体的过于宽泛而表现出学科的泛化。党圣元论述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阐释的当代性问题。他认为“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的产生与西方学术体系的引进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比可以见出各自的特点。“以西解中”是古代文论近一个世纪的现代研究史主导的理论运作方式,综观百年学术史,古代文论研究中的“文化视界融合”问题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而迄今尚未厘清的问题。他认为,文化时间上古与今的关系、文化空间上中与外的关系,以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求是与致用、研究者个体与理论传统整体、经典解读与理论创造等等诸般关系,皆可置于此“视界融

合”中加以融会贯通的分析,“视界融合”似可作为分析传统文论现代遭际的收结点。现代性是多元化的,所以跨文化的对话交流能给世界文化格局带来的最为理想的境地就是“和而不同”,这也是维系全球文化生态平衡的一个必要前提。李明以比较的角度谈了文学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及其实践问题,以及现代中国文学“工农兵”方向研究的问题。

二、生态文学的学科发展与建设问题

生态文学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热点议题,会议就生态文学的认同、生态文学研究的学理化及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张汉良先生认为,生态文学是生态对文学的渗透,他把生态文学论述分成两类:第一类属于生态政治学的文学研究,和大多数以意识形态与身份政治学为基础的文学批评相似,他们以政治姿态和伦理介入的方式探讨文学或文化文本;第二类属于生态科学的文学研究,以生态系统(ecosystem)为基础,具有相对的科学性和实证性。我们的兴趣不是生物学,而是文学,但是我们应该了解生物学方法对比较文学的渗透。程金城(兰州大学教授)认为,近年来,“生态”意识与“人文”理念的结合,衍生出许多新的学科分支和相近的研究领域,如生态文学、生态文艺、生态批评等。“生态”概念的引入,一方面为一些传统的学科领域注入了新的元素,激活并创造出新的理论范畴和研究层面;另一方面,这些范畴和领域又常常相互重叠和裹缠,甚至在研究对象、目的方法上相互重复,并未从各自层面和维度推进研究的真正深入,所以我们在讨论生态文学时,既需要“分殊”又需要“整合”。需要对以往的研究前提、逻辑起点做一些清理和思考,将生态文化、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对象整合于一个焦点,首先回答一个基本的“元点”问题:我们讨论“生态”问题和生态文化现象,是要解决和回答什么现实和文化的根本问题?或者说,是什么样的自然、社会、人文现象使我们发现“生态”是一个需要从哲学、美学、文学、批评实践等方面解释并回答的重大问题?通过研究深化我们的认识。王为群(兰州交通大学中文系)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生态文学存在着研究对象和内容不确定的现象,泛化和狭隘两种倾向同时存在,生态文学研究一定要坚守文学的本体价值观,“生态”只是一个视角,一个价值体系,不要过早过多地限于概念的推理和名词的演绎。朴宰雨从中韩文学对话角度,介绍了韩国生态文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他说,韩国的生态文学可以追溯到高丽时代白云李奎报的咏物诗,现代意义的生态文学出现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80、90年代得到了相当成长,进入21世纪以后呈普遍发展之势。韩国生态文学有三种题材类型,一是民众指向型的,二是传统型指向型的,三是现代主义指向型的。90年代,生态文学话语活泼化,出现四种倾向,一是派生出多样视觉生态文学论,二是关注东方思维体系,三是从诗人的直观提出隐喻的展

望,四是提出“生态小说论”主张。朴宰雨指出,1960年代韩国经济腾飞的时代,官商勾结只求经济增长,严重破坏了环境,是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呐喊与抗争才使各种污染和毁坏得到遏制,使生态状况好转。他认为韩国生态文学的发展脉络和中国大陆及台湾的“生态文学”有同步性、交叉性和共同点。杨琳的发言论述了后发展现代化背景下生态文学的发展生态。温越从学理上对生态文学的批判性与现实文学的批判性进行了疏理。夏静探讨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双重遮蔽及解蔽问题。

三、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双重关怀

在会议发言中,雷达、刘青汉、杨素梅、江锡铨、张语和等学者阐发了精神生态的重要性。雷达说,经济发展的速度应该与一个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速度基本平衡,应该关照社会的生态资源和人的精神结构。他认为,会议讨论的生态文学是一个尖端前沿的也是与现实密切关联的一个议题,文学不能丧失关怀现实的功能,而目前,出现严重的生态问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要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生态危机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根本的,生态破坏的根源在于精神,精神生态的危机、怀疑永恒、没有敬畏心等等是更为深层的危机,要解决之,生态文学大有所为,为人们解决自然生态危机与精神生态危机提供一种精神资源。刘青汉(兰州交通大学中文系)论述了希伯来文化对欧美生态文学具有的重要的资源意义,认为生态文学应该关注健康的精神资源、思想资源和心灵资源,应该关注大地伦理与生态公义,首先应该讲天理,借用托马斯·阿奎那的说法,宇宙间有三大法则,一是永恒法,二是自然法,三是人造法,这三大法则的次序不能颠倒,颠倒必然导致灾难。张语和(西北师范大学)说自然是最好的启蒙者,讲生态文学应该讲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结合。杨素梅(河南大学)所关注的论题是俄罗斯文学中自然生态的发展逻辑链,对利哈乔夫的文化生态观进行了本文细读。高翔(《社会科学辑刊》总编辑)对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生态观进行了多层面的探讨。孙禹结合自己的旅美经历论述了音乐美学、艺术美学与人类生态关怀之间的关系。

四、生态文学的文本分析

金贤珠(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认为古人一般将自然神圣化,古人可能认为与人生相联系的天地、山水、动物等都充满着神秘的生命力,因而人类向自然敞开着胸怀,自然又深深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她从孟浩然接触自然、感悟自然及其自然观的意义等三个方面作了论述。认为孟浩然通过接受大自然的洗礼,清除了世俗的七情六欲,并将自身隐于大自然,从中领悟到了一个知识分子追求绝对真理和求道者向往的理想世界。金贤珠指出:只有当人类和自然以及保障二者

之间平衡的生态规则、生态伦理、生态美之间和谐结合的前提下,文明才能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宋丽丽(清华大学副教授)以小说《狼图腾》为例,结合欧美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着重从康门纳的生态原则出发,讨论了人类赖以融入其生存所在区域的生态智慧,即个体融入整体后,与整体形成一个生命网络,并根据整体的感悟调节自身行为节律的能力,阐释了环境文学的区域性叙事与生态智慧。她认为:《狼图腾》与其说是关于狼的书,毋宁说是关于草原的书,或是草原生态学的书,《狼图腾》中的叙事主体是草原,并从草原叙事中体现出一种生态智慧,即不是来自于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而是来自于生存与世界中的生存者的直接感知,将自身与生存世界合为一体的感知,与区域形成一个生命整体后感知到的智慧。徐美恒(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探讨了风景描写的社会学意义与审美意义。文学描写风景,传达的是一种亲善自然、挚爱自然和崇敬自然的生存心态,流露出一种博大的人生胸怀。以波兰符拉迪斯拉夫·莱蒙特的小说《农民》为例,徐美恒认为,中国的当代文学越来越丧失了对风景的热情,相形之下,《农民》大段大段地描绘了波兰的风景和气候的变化,把波兰的风景和波兰民众的生活有机融会在故事中,作品所具有的一种大气磅礴的民族风格就显示出来了。而莱蒙特对风景描写的嗜好,出于其对土地的赞美和恩爱的情怀,人始终依附大地,是大地养育的子孙。莱蒙特关注自然风景的独特心理智慧状态有益于现代社会的人性建设与文化建设。李莹(兰州交通大学教授)从生态批评的立场出发,对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中源氏的形象进行了重新解读。

五、关于西部的文化关怀与生态关怀

西部的地域特点和独特的人文氛围和文化,决定了西部生态文学作为最具有民族性的和独特文化气质和某种文化边缘性的文学,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生态文学与批评有积极意义。正如阿来《普遍的眼光》中所说:“异族人过的并不是另类人生,欢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获得与失落,所有这些需要,从它们让感情承载的重荷来看,生活在此处与别处,生活在此时与彼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西部地域及文化给作家带来的优势,历史和传统因素提供的丰富素材,民族文化传统的独特视角,使文学的这种边缘性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前沿性价值,作品中的生态关注,对弱势文化的重新定位,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新的地域表达元素。西部作家的写作活动,也把西部人关注自然的声音传向世界,用文字呼唤对自然、生命的尊重,用创作进行着人类意义上的思考,表达着民族的精神风貌而非简单的民俗化抒写。赵学勇(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对“西部文学”的概念、命名及历史发展的演变过程作了新的诠释,他认为,对“西部文学”的研究应该置于新文学的整体流变中进行考察,目前,学术界和评论界普遍将“西部文学”的产生界定在1980年代初期,实际上,早在1950年代,随着新文学中心的“西移”,

“西部文学”就以其厚重的创作实绩迅速崛起,且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中,西部作家的创作大体上可分为“四代三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是在《讲话》发表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以柳青为代表。第二个时期是1980年代,这一时期的西部作家由两代人组成,其中一代是以王蒙、张贤亮等为代表,是以“外乡人”的身份看西部、写西部;同期的另一代作家几乎都是地道的西部“土著”,张承志、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扎西达娃、陆天明、杨争光等,他们凭借其日趋成熟的作品成为“西部文学”的中流砥柱。第三个时期应该是从1990年代中期直至当下,这一代作家几乎全部具有“本土”身份,如阿来、红柯、董立勃、雪漠等,他们的创作仍然还有巨大的开拓空间。赵学勇认为,“西部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唯有将其纳入更宏阔的文学史视野中,给予全方位透析,或许能给西部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活力和生机。邵宁宁(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对近多年西部文学创作的现状与症候进行了体验性陈述,他认为西部生态文学创作应该更为切近地关注本地域民众的生存及生态改观实效性,应该在关注文学家的紧迫感的同时更加关注生存于西部大地上的老百姓的现实紧迫感。张未民主编在发言中提出中国时空,中国历史延续性问题,认为中国西部历史所走的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之路。周乐诗(《中国比较文学》编辑部副编审)发言的主题是西部自然生态与当下中国文化建设的人文关怀。王为群说,怎样既满足人合理的需求又不致让人与自然对立,这是个生态公义问题,发展的合理性基于生存的合理性。徐兆寿(西北师范大学)认为,甘肃是一个多民族和多文化交汇的地带,是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和儒道文化等文化资源都相对丰富的地带,当下生态文学创作应该汲取丰富的精神资源。

比较文学史上的“恒常危机”

——兼论生态论述

张汉良

这篇论文是应兰州交通大学邀请,在其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发表。全文分成四部分:(1)比较文学在欧美的发展;(2)比较文学的危机论述;(3)晚近的殖民论述危机;(4)生态论述的危机。

一、比较文学在欧美的发展

请容我简单重述一下比较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分三个阶段:作为一个学科,在法国先开始。1920年代到1950年代,法国比较文学者都把比较文学看作文学史的一个分支。什么文学史呢?就是跨国文学史,欧洲文学通史。比方德国文学,歌德怎样影响英国,在英国的接受史;英国某个作家怎么传到德国去。作文学跨国之间因缘关系的流变,这可以称为比较文学史课题所研究的对象。基本上这种课题比较关注的主要是哪个作家他写了什么东西,他的作品怎么被翻译,怎么流传,翻译成英语以后在哪个出版社出版,比较注重外围的文献材料的收集。对文学文本的探讨比较少。各位要知道,比较文学史家的兴趣是要写一本泛欧跨国文学史,欧洲文学通史,或者说欧洲文学关系史,因此它不太会对个别文学作品的美学含义作深入探讨。比较文学在法国最早就大体是这个情形。

到了40~50年代,有一些欧洲移民到了美国,他们搞比较文学基本与欧陆传统切断了,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转向:要研究文学就要研究文学作品,研究文本。基本上他们研究的东西是纯文学,如诗、小说、戏剧等,历史或传记等都不算纯文学,那时有很严格的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纯文学与非纯文学,所谓的纯文学是想象文学、虚构文学。台湾、香港在70年代介绍比较文学时大体上走得是这样一条路,喜欢对文学文本的美学考察。

这个做法在1970年初的欧美有一个很大的转向,但学者并不是再回到老的历史主义再去搞文学史了,他们觉得没有办法把文本从历史、社会的背景中抽离

出来,作为一种孤立的欣赏。文学文本跟周围文化的氛围,跟社会、经济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它又回去看文学史了,他们的文学史与1920年代至50年代法国比较文学谈的文学史不太一样,他们很强调语言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1970年转向的特质之一是,文学与非文学分野的界限泯灭了。我举个例子来讲,史书,历史课本,我们以往没人把它当文学来读,但写历史的人也用文字,文学技巧,书写技巧会干扰你的再现,因此很多人说历史说不定也是虚构的。人们对非文学如传记、自传的研究在1970年末80年初的时候变得非常重要。我们不再去研究那些传统的诗、小说、戏曲,而是研究那些不太被接受的文类。大体上在1970年有这样一个分野。同时比较文学受到批判思潮、后结构哲学思潮影响,它对文学整体知识系统、知识论发生兴趣。所以许多比较文学学者都去搞理论去了,不在专注于文本分析与鉴赏。他发现文本本身都是值得争论的,我认为在80年代有一个对知识论的重视,大家开始对理论发生兴趣。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相互干涉,前面我已经提到文学与非文学文本的界限没有办法分清楚,大家知道在80年代常常会研究文学之外的文本、文学彼此怎样颠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转向。

最后一点大家知道的可能比较少,就是生物学方法论对比较文学的渗透。传统上习惯把自然与文化作二分,nature/culture,我们说自然是没有人干扰过的文化,其实这种二分法在70、80年代也受到大家的挑战。自然也是经过人为的干预的,是人建构的自然。生物学影响非常大,这两年流行“生态诗学”,它是怎么来的?生态学是生物学的一支;人跟环境的互动就像文学与环境的互动,我们可以从社会生物学的观点出发来探讨。

二、比较文学的危机论述

以上介绍的学科演变也有人以危机论述来说明。在1984年的一篇短文里,我指出:“今天回顾起来,这半世纪的比较文学史至少已经历三个大危机,产生了三个文学研究的典范。”上面这段文字是二十三年前写就的,在这期间,尤其是最近十五年,比较文学的发展自然是另有变化,待会儿我进一步申论。

有一个重点我必须要先说明。正如同“比较文学”是一个外来语的翻译,指涉一门由国外引进的学科一样,“危机”这个名词其实是学者选取了一个现成的汉语名词,用来翻译一个英语术语:crisis。因此我们不宜就汉语望文生义。英语的crisis来自古希腊语,它和critique(批判),critic(批评者),criticism(批评)同一字源,属于同一字群。原来是“决定”或“判断”的意思,在病情发展的诊断上用的很多,就这层意义而言,“关键”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翻译。亨利·雷马克于1960年发表了一篇回顾文章:《十字路口的比较文学:诊断、治疗与处方》(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Crossroads: Diagnosis, Therapy and Prognosis),他虽

然没有用 crisis 这个字,但是他却点出了危机论的原始医学意义。后来参与危机论述的学者大体上都遵循这个说法;亦即:他或她正处身在一个学科发展过程中,令人忧虑的阶段,学科出现了病灶,再继续下去情况可能会更恶化。字源的医学含意姑且不论,让我们把“判断”或“批评”这个字源意义纳入我们的学科,危机可以具有两层意义,也就是说有两个层次的危机:(1)比较文学作为危机(充满危机与转捩点的批评[critical])文学;(2)文学批评(criticism)作为危机文学。这个看似悖论或吊诡的双关语替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建立了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也隐藏在大多数危机论述文章里面。

下面我要讲最近十五年的发展,与国内的学术生态关系比较密切。1989 年我在葡萄牙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所举办的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标题勉强可中译为《西方文论做为殖民论述——[再来一个!]比较文学的恒常危机》,其中显然有强烈的反讽意味。文中提到学术气候的改变,虽然我并不认同殖民论述的身份政治学。当时我在学术场合或刊物上发表过一些言论,批评这种论调。却没想到,过了几年,殖民/后殖民论述竟然成了显学。至于危机论,它诚然有它的恒常魅力,过不久就被人拿出来重新炒作。

三、晚近的殖民论述危机

我要介绍的近十五年发展针对在英美执教的两位女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斯匹瓦克(Gayatri Spivak),二人以殖民论述和文化区域研究为基调和主轴的危机论述。巴斯奈特在 1993 年出版了《比较文学:一本批判性的导论》;而斯匹瓦克于 2003 年出版了《一个学科的死亡》。这两本书都相当流行,在亚洲也拥有不少读者。她们所呼吁的新方向,颇能引起不属于欧美主流传统的,后来才参加比较文学阵营的中国学者们的欢迎与喝采,尤其是她们都注意到了大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我愿在此提出逆耳忠言,奉劝学者仔细反思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国文学到底算不算是第三世界文学?中国在历史上有什么被殖民的经验,需要大书特书殖民/后殖民论述?新思维欧美学者反欧洲人文主义典律,是否在逻辑上可以推演到中国人也应该东施效颦,反对甚至抛弃中国文学传统?换言之,西方的议题是否必然与我们有关?

巴斯奈特开宗明义地便指出比较文学的危机,她说:“当我们再度检视比较文学这个名词时,我们会发现它是一段激烈论辩的历史,从 19 世纪初这个名词出现的时候一直持续到今天。处身在 20 世纪末后现代主义时期的批评家,仍然和一个多世纪以前所提出的问题缠斗不休: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比较] 怎么能够成为研究对象? 如果国别文学有典律,那请问比较文学的典律是什么? 比较文学家如何选择比较的对象? 比较文学是一种学科吗? 或者它只是一个研究领域? 这一类的问题拒绝退场。从 1950 年开始我们一直不断地听人

提到韦勒克所谓的比较文学的危机。”(页2)

我们难免怀疑:如果这些是老问题,那么就不应当有危机了;老问题不可能具有发动及操纵文学史运作的危机动能。我们勉强只能说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或者更正确地说,事实上它们属于不同时代的问题,因为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会产生与发现新的问题,而不是有一些存在了近百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需要新理论和新方法来解决。我们可以说:原来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新理论使它们发生了质变。这是基本的文学批评史认知。也许我们可以引用我在1984年的一篇短文《当前文学的危机》所指出的典范转移来说明这个现象。变易或危机是比较文学史的演化机械,变易的原因便是信念、理论、方法相同的文学研究团体,以及它可能形成的典范,不断地受到另一些团体的挑战。

巴斯奈特举出实际的例子,说明了我所谓的典范转移概念:到了1970年代末期,西方大学的研究生纷纷转向文学理论、女性研究、符号学、电影与媒体研究以及文化研究,抛弃了比较文学,使它越来越像“人文主义史前史的恐龙”(页5)。另一方面她发现,虽然比较文学在西方危机接踵而来的情况下苟延残喘,但是在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却开始生根,与国别文学的特殊性密切结合。这里无疑点出了国别文学与比较文学的介面,透过这个介面,国族与身分认同的议题才能被表述。根据这个推理,并不是学科的危机论只有在西方才存在,有比较文学的地方,甚至有文学的地方,就有危机。巴斯奈特在第三章讨论英国国内的各种文学的比较(页48-69),其实已经把第三世界的国族认同问题回馈到第一世界。

上面在巴文中引述的,作为恒常危机指标的六个问题:(1)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2)“比较”怎么能够成为研究对象?(3)国别文学有典律,比较文学的典律是什么?(4)比较文学家如何选择比较的对象?(5)比较文学是一种学科吗?(6)或者它只是一个研究领域?这些问题,没有一个不存在于所谓的第三世界。巴斯奈特把世界做了新的三分:(1)旧世界,指欧洲;(2)新世界,指美洲和新西兰;(3)第三世界,属于除了(1)、(2)之外的世界,当然包括中国。为了便利讨论,她不但三分天下,竟然把这三种世界分别同质化。谈到第三世界,我们不禁感慨。试问:既然我们的学科是文学,就传统的悠久,底蕴的深厚,中国文学难道没有超越旧世界?或至少与它分庭抗礼?除了在现代化的进程上与政治立场的取舍上,中国和第三世界有亲和性外,中国文学岂属于第三世界文学?既然新比较文学史讲求再脉络化,讲求个体文化的殊相,就万万不能把世界以旧的思维方式化约。

表面上看来,巴斯奈特和我在曾另文抨击过的魏斯坦因正好相反,魏氏所忧虑的两个危机:(1)比较文学在欧美之外的快速扩展,和(2)理论的强势,反倒成为巴氏认为学科的转捩点。对巴斯奈特而言,比较文学已名存实亡,取代比较

文学的是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翻译研究。她尤其乐道后殖民论述,认为这个辞汇代表的新跨文化批评,简直就是换一种说法的比较文学(页10)。巴斯奈特以一个相当严重的字眼儿“死亡”(“dead”, “demise”)来描写学科方向的改变。“危机”还有希望,“死亡”却一了百了,其耸人听闻可想而知。

若干年后,2000年,斯匹瓦克在加州大学尔湾校区发表了韦勒克讲座,题目就叫做《一个学科的死亡》,三年后经过修正结集出版为一本小册子。在讨论斯比瓦克之前,我必须顺便提到比巴斯奈特的书要晚两年出版的一本文集——《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比较文学》(Bernheimer 1995)。编者勃恩海默在序言中杜撰了一位求职困难的研究生,说她今天[1995年]面临的困境,与三十七年前韦勒克发出危机呐喊时,并无二致:“缺乏明确的主题以及特定的方法”(页2)。勃恩海默所提出的各项方案,充满了折衷主义色彩以及和文化研究妥协的立场(页43-45)。和巴斯奈特应和的则是近二十年来甚嚣尘上,但令人生厌的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应邀撰稿的史坦福大学名牌教授玛丽·路易兹·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好一幅中央情报局的嘴脸:“有三个历史过程导致了比较文学目前的走向:全球化、民主化、去殖民化”(页59);最后一点包括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对话,以及美国对欧洲文化的反殖民化运动(同上)。这本书竟然成为流行宝典,也一再地被斯匹瓦克引述。

说来也是巧合,韦勒克在1958年首先提出危机论述,42年之后,斯匹瓦克发表演讲“一个学科的死亡”的场合竟然是以韦勒克命名的讲座系列。从危机到死亡,她似乎在接着巴斯奈特,宣告比较文学寿终正寝。反讽的是,这个耸人听闻、颇为煽情的书名和内容并不符合,因为斯匹瓦克提出“新的”比较文学。既然如此,怎么说比较文学死了呢?

什么是新的比较文学?斯匹瓦克根据一个简单的二分逻辑来解释世界和比较文学:老的比较文学是北半球的,是欧美的(她用了Euro-US这个词,使它具有强烈的铜臭意味),这个欧美传统,用她的比喻来说,就是大都会的(Metropolitan);和它相对的,新的比较文学则是南半球的,草根的,或者她所喜欢用的被压迫的他/她者(subaltern)。这种新的文学应该全面处理后殖民问题(postcoloniality)。换言之这个学科有强烈的工具性,斯匹瓦克说:“正如同社会主义要坚持不断地把资本主义的资本压榨干净一样,新比较文学要坚持不断地颠覆和瓦解统治者的奴役新兴者”(页100)。她鼓吹学者调整研究方向,转注南半球弱势语种和被殖民者的文学,细读他们的作品(页72)。我禁不住要问:如何阅读?用什么方法和策略来阅读?你用的细读方法难道不是在美国学院文学系,尤其是英文系,所学到的那一套后设语言:后新批评的意识型态论述?亦即:庸俗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解构?口头上的反霸是斯匹瓦克作为印度出身的女性主义者一贯的立场;至于她在美国帝国主义的长春藤联盟哥伦比亚大学